



总主编：李玉明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
【三十五辑】

鲁迅与山西

董大中 著

山西不像福建、广东、南京，更不像浙江、北京、上海，甚至也不像陕西，那些地方鲁迅曾经较长时间生活过，或专门去讲过学，山西的土地上仅仅留有鲁迅几十、几百个脚印，时间也很短，然而，他在小说里或文章里说到山西的地方却格外得多……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鲁迅与山西 \董大中著．太原市：三晋出版社，2010. 11

ISBN：9787545703115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（三十五辑）总主编：李玉明

鲁迅与山西

董大中 著

出版社：三晋出版社

ISBN：9787545703115

定价：4.00 元

内容简介：山西的土地上仅仅留有鲁迅几十、几百个脚印，时间也很短，然而，他在小说里或文章里说到山西的地方却格外得多。

目录

引子 1

一、跟鲁迅接触最早的山西人 2

二、黄河岸边的“考察” 7

三、“狂人”的原型出在繁峙 9

四、一个主将和一群战士 11

五、鲁迅和荆有麟 14

六、鲁迅《致榴花社》信及对山西木刻青年的教诲 17

七、永远活在山西人的心里 22

引子

山西不像福建、广东、南京，更不像浙江、北京、上海，甚至也不像陕西，那些地方鲁迅曾经较长时间生活过，或专门去讲过学，山西的土地上仅仅留有鲁迅几十、几百个脚印，时间也很短，然而，他在小说里或文章里说到山西的地方却格外得多。1924年作小说《在酒楼上》，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为生计而到处奔波的小知识分子，最后“辗转到太原”教书。一年后作《孤独者》，小说中的“我”，走过历城、太谷，“一总转了大半年，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”，最后访问朋友时，手里“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”。这两篇里的太原、太谷、闻喜，都是山西地名。鲁迅写现实生活的两本、二十五篇小说写到的真实地名，属于其他省的大概只有历城和山阳，远比写山西一地的为少。后来在谈及“怎么做起小说来”，鲁迅论述了他的典型化方法：“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。”浙江是鲁迅的故乡，北京是他从民国初年起住过15年以上的地方，而山西却没有去过，闻喜是远在晋南的一个县，他不仅写了，而且写的是这个县的著名特产。可见鲁迅对山西颇为熟悉，似乎成为他潜意识里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。实际上，鲁迅跟山西存在着人事上、知识上多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正是这些联系使他对山西有着某种难抹的印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以他对山西的了解，经常使用一个词，即“山西人”。据笔者印象，鲁迅至少四次使用这个词。一次是民国初年在教育部，评价新来的教育部长梁善济，说“山西人，不了了”；第二次是为山西人作保；另一次是同高长虹发生冲突后，在给许广平信中说，毕竟是山西人，要吸血的；再就是上海跟日本人内山完造闲谈，不止一次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，会经商，爱财，还有其他特点。鲁迅称“山西人”一词，在文中显得特殊。其他，像“北京人”、“浙江人”之类说法，就从来没有。此“山西人”之称，别有寓意，使用时似带有虽说程度很轻但完全能够感觉出来的贬义。在这本小册子里，“山西人”将作为一个关键词而存在。

笔者对这一现象早就发生兴趣。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，各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。我当时在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工作，特地在刊物上开辟了《鲁迅与山西》的专栏，刊发了著名学者王瑶和其他人的4篇文章。将近10年前，笔者又和王峻峰、郭汾阳合写过一本同名的30余万字的专著。本书是对这本专著的浓缩和深化，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思考。

一、跟鲁迅接触最早的山西人

鲁迅最初跟山西精神上的联系，是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。

鲁迅于 1898 年离开故乡绍兴，到南京求学。先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，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矿务班，1902 年初毕业。矿路学堂的课程有金石学（即矿物学）、地学（即地质学）等。鲁迅在此读书 3 年，成绩优秀，以后继续搜集资料。1903 年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写出《说钼》（钼今通作镭）和《中国地质略论》两文，又跟同学顾琅合编《中国矿产志》一书。在那之前，帝国主义列强出于经济侵略和殖民掠夺的需要，派出许多科技人员，对我国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探。据勘测结果，山西的煤炭储藏量非常丰富，为全国之最，足够世界一千年（一说六千年）之用。《中国地质略论》和《中国矿产志》都论及山西矿产资源，后者特辟专章论《山西省矿产》。

鲁迅的青少年时代，是在我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之苦下成长的。鲁迅的故乡绍兴地处沿海，附近有中英《南京条约》规定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，绍兴城内也有了外国的教会，颇为霸道。章太炎在《徐锡麟传》中就说，“绍兴城中有大善寺，天主教会欲得之”。这种情形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精神。青年鲁迅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格，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。到日本后不久，他在《自题小像》中立下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伟大志向。在学习矿产知识时，已经认识到开发矿产在富国强民方面的巨大作用。《中国地质略论》中说：“石炭者，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，而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者也。”同书第二章更有这样的话：“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。可容外族之研究，不容外族之探捡；可容外族之赞叹，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。”文中写到德国人利忒何芬在中国各地考察情况。利忒何芬曾说：“惟扼胶州，则足制山西之矿业，故分割支那，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……”鲁迅述及此事，又一次明确表示了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阴谋的高度警惕，他说：“一文弱之地质家，而眼光足迹间，实涵有无限刚劲善战之军队。”

哪里有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，哪里就有被掠夺者的爱国主义怒火在燃烧，反抗运动在开展。1906 年，山西人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争矿权”运动，而这一运动发起地正在日本的东京，鲁迅当时就在东京自学。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了唤起全国人民对这一活动的注意，蹈海自杀，在留学生中引起震动。这是留日学生中爱国主义热情的一次大喷发。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显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现在所知，鲁迅留日期间所交往、所接触者，都是浙江同乡，而未见有外省人。在写《鲁迅与山西》一书时，笔者致信同乡前辈李尤白，问及几位山西人跟鲁迅的关系，李在复信中说，他知道景梅九跟鲁迅有过交往。他说，1947 年或稍后自己在西安帮景梅九编《国风日报》时，曾经看到过景写给柳亚子和鲁迅两封信的底稿，以及鲁迅逝世后景的两首悼诗，该诗当即在报上发表，已经引用在所写景梅九的传记里。又说，“有一次景老来我寓，和他谈起章太

炎、鲁迅、郭沫若等人时，他说他在日本留学时，在章太炎寓所与鲁迅相识，鲁迅还可能比他大一点，郭沫若则比他小，去日本留学也晚。章太炎则比他们都大着好几岁。”景梅九为山西安邑（今运城市盐湖区）人，名定成，梅九为字，生于1882年3月，小鲁迅半岁。幼聪慧，12岁中秀才，17岁到太原入晋阳书院、令德堂就读，后转入山西大学堂中斋，接着被选送入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）。1902年冬考取官费留日，入东京帝国大学本乡第一高等学校理化科，比鲁迅赴日晚半年。他是山西最早的留学生之一，后被选为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。以后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，是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，山西留学生的“争矿权”斗争即是由他参与发动的。1904年初，女革命家、浙江人秋瑾赴日，景找到秋瑾，畅谈革命，甚为相契，后跟秋瑾等人合伙创办《白话报》，是景从事新闻事业之始。此后经常跟秋一起开会，秋瑾回国，景担负送行之责。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，景又结识章太炎，跟孙中山等人亦来往频繁。景是章所办《民报》的主要撰稿人之一，景有关山西“争矿权”的笔锋犀利的系列时评都在《民报》发表。1906年11月27日《民报》举行周年纪念会，景参加筹备，孙中山、章太炎发表演说，由景担任日语翻译。景随后创办《第一晋话报》、《晋乘》、《汉帜》等报刊，宣传革命，抨击君主立宪谬论。1907年初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鼓吹君主立宪，景跟宋教仁、张继、黄兴等一起，受同盟会指派，将梁赶下了台，后来他在中篇白话小说《罪案》中对此做了生动描写。景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三种报纸，最有名、时间最长的是《国风日报》，被称为“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创办的报纸”，其地址曾被清廷官府搜查。为此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发勋章。后景提倡“无政府共产主义”，国内的喉舌《学汇》专刊就载于《国风日报》，每天一期。他又是世界语的积极提倡者，《学汇》鼓吹尤力，景亲自把爱罗先柯的《世界语者之宣言》翻译发表。鲁迅曾任教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，景是积极发起者，陈廷璠所写《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提议》亦载于《学汇》。以后景致力于国学研究，在考《红》治《易》上成就突出，其所著《石头记真谛》为“红学”索隐派集大成之作。有人把景跟章太炎相提并论，有“南章北景”之称。从1906年6月章太炎到日本，至1907年景从帝国大学毕业回国，景和鲁迅同在东京约一年半。此时鲁迅尚未听章太炎讲《说文解字》，但前往拜访不是没有可能，两人相见即在此时。鲁迅是后来所用笔名，当时用原名周树人，所以景在《悼鲁迅》诗开头说：“庐山真面无人识，鲁迅原来却姓周。”景梅九可能是鲁迅所接触的第一个山西人。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高长虹“似是安那其主义者”，当因高跟景梅九关系较好，误为二人思想相同，以致有此推断。

如果说景梅九跟鲁迅在日本东京见面细节不易证实，那么，另一个姓景的山西人景耀月就很可能是鲁迅冲破同乡圈子，开始跟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打交道的一个重量级人物。景耀月，芮城人，1844年生，比鲁迅小三岁，是“推翻满清，建立共和”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。辛亥革命成功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，景耀月以同盟会中坚干部名义出任次长（各部大都如此）。鲁迅经许寿裳推介，到教育部任职，成为景耀月的“部属”。蔡元培北上接袁世凯南下，部务即由景耀月代理。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写道，景在

部扩充自己实力，欲拉鲁迅到身边而鲁迅拒之，遂产生隔阂，景于是在报请大元帅府任命的部员名单中划去“周树人”三字，但被南返的蔡元培制止。鲁迅对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感到失望，1961年请同仁陈师曾治印，嘱刻“俟堂”二字，据许寿裳解释，意思是因受到景耀月排挤，乃以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自命，并跟陈师曾“槐堂”的室命相匹配。后鲁迅以“唐俟”为笔名，亦由此而来。

景耀月使鲁迅看到了山西人不好的一面。两年后，另一个山西人梁善济（1861年生于崞县，进士出身，留学日本法政大学）当了教育部次长，此时教育总长为汤化龙。汤和梁都有立宪派的渊源，合组过民主党、进步党，是后来“研究系”的元老。有景耀月坏印象在先，现在来了一个“立宪派”，鲁迅的心情可想而知。1914年5月12日，梁善济到部就职，鲁迅在《日记》上写道：“次长梁善济到部，山西人，不了了。”这是鲁迅文中第一次使用“山西人”这个词，表示山西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有其不同之处。接下去说“不了了”，有贬义。这自然包括景耀月在内。梁善济刚到部就有此印象，显然以对山西人总的看法为基础，并非出于对梁本人深入了解所做出的评价。

还有另一件事发生在山西人身上。鲁迅初到教育部，属于“同司同室”的有山西人冀贡泉。冀为汾阳人，亦留学日本。所谓“同司”，即社会教育司；所谓“同室”，即同一个办公室。冀为科员，鲁迅1912年先任金事，8月任科长，正是冀的“顶头上司”。冀回忆说，他们两人“同桌办公”，都喜欢看书，无公可办时就各自埋头读书。1913年初，在山西执政的阎锡山联合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以及外国人李提摩太、庄士敦，由贺长雄、李佳白等发起，在太原文庙成立尊孔社团“宗圣社会”，由书画名家、时任设在文庙的山西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柯璜具体承办。柯起草了一份成立缘起的文件，送到教育部备案。这正是鲁迅这一科应办之事。冀贡泉在回忆中说：“记得有一天，我上班稍迟了些时，一进门就听到他们大笑之声，且分明是他的声音。他是不轻易笑的，但我一进去，他们就不做声了。我追问了他们为何这样态度？最后他说：‘怕你不好意思，我们笑是因为今天才收到的一件公事。它是从你们山西来的，你看了就会知道。’”这件公事便是要求批准成立“宗圣社会”的呈文。鲁迅说：“这名儿就可笑了，更不要谈内容。”又说：“我们笑尽管笑，研究还要好好研究，你也应当细细打听一番，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，出丑是中国人的。”据《宗圣汇志》一卷四号载，同年夏天，临汾县一宗圣社员拟办一书院，呈文到部，亦有批示，批文在“应即准予立案”后，也说到“惟书院名目不合”，应予修改。尊孔与反孔之争，从维新运动以来就已经存在。“反孔”符合时代潮流，当时视为进步，但主张者人数少得多。而崇圣、尊孔，却具有极大社会势力，即使那些“革命党”，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把崇圣、尊孔挂在口头上，推行不遗余力。山西人不免保守，民国刚刚成立，就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打出了“宗圣”的旗号，所以鲁迅说这是“给山西人出丑”，给中国人“出丑”。鲁迅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，这次的笑谈乃是“五四运动”前鲁迅反对孔儒学说、反对旧礼教思想的反映。

冀贡泉在教育部工作，跟景耀月任次长是同一时期，在梁善济就任以前。虽然冀和鲁迅

两人都喜欢埋首书中，但既然同处一室，各自谈论本地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。冀的故乡汾阳是“晋商”发迹地之一，跟“晋商”大本营榆次、太谷、平遥、介休等地相邻，可以想见，鲁迅有关山西人善于经商、爱财如命等方面的知识，冀贡泉当是最主要的介绍渠道，而且是在民国初年。爱财的另一含义，是唯利是图，或说求利而忘义。现在加上保守，这就是民国刚刚诞生时鲁迅所了解的山西人。冀本人是留日出身，属知识分子，跟商人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鲁迅跟冀的关系自不一般。1913年4月27日晚上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仁10人在前门外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举行宴会，为即将离任回山西的冀贡泉饯行，鲁迅是其中之一。以后冀贡泉到京，鲁迅都要宴请。如在1915年8月6日、1916年7月21日的《日记》，鲁迅都有跟冀共饮的记载。

在教育部任职的山西人，还有崞县（今原平市）人狄桂山。狄在普通教育司任主事，1915年元旦曾到鲁迅所住绍兴会馆拜访。

跟冀贡泉同事一年多，引来了另一些山西人。1914年2月5日，山西人翟用章投考知事，持已离开教育部、此时在太原的冀贡泉的介绍信，请鲁迅作保。鲁迅答应了。八个月后，同年10月15日，冀贡泉本人和另一山西人到北京办理律师手续，又请鲁迅作保，鲁迅同样慨然允诺。《日记》云：“出律师保结二：冀贡泉，郭德修，并山西人。”1915年4月3日，鲁迅再为山西人景万禄、白尔玉作保，投考知事，不过这次是由好友许寿裳先生介绍的。第一次为翟用章作保，也有许的介绍。许寿裳何以会介绍山西人请鲁迅作保，不得而知。鲁迅为别省人作保，《日记》极少记载。三番五次为山西人作保，给了他了解山西、熟悉山西和认识山西的机会；这些人麻烦鲁迅，自不会空手而来，虽然《日记》未记，但以中国人情之常，很可能带有礼品。如冀贡泉1921年10月2日就送汾酒一瓶，以后的高长虹、荆有麟等熟朋友都有礼品相赠。汾酒是山西人赠鲁迅最多的礼品，除冀外，高长虹、唐诃等都几次以汾酒相赠。1923年7月，鲁迅和周作人“兄弟失和”后，心情郁闷、悲愤，以至病了一场，连饭也不想吃。这年11月8日，鲁迅“夜饮汾酒，始废粥进饭”，汾酒竟有如此奇效！有的人，带来了家乡特产闻喜煮饼，鲁迅尝过，味道甜美，这就成为《孤独者》中那个细节的原始材料。

在跟山西人不断交往的同时，山西的“历史文物”和古代山西人的著作又先后进入鲁迅眼中。鲁迅收集了许多山西古钱和碑帖拓片，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、反清义士傅山遗留下的文物和书画，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。

民国初年，鲁迅因失望于辛亥革命，理想破灭，长期住在会馆里抄古碑，辑古文。1912年鲁迅到北京不几天，即从琉璃厂购得唐王绩（河津人）《王无功集》。1913年3月27日，鲁迅辑录谢承《后汉书》毕，写出《谢承〈后汉书〉序》。序中说“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，以校《曹全碑》，无不合”，又据《困学纪闻》所载“傅山自云其家”几种古籍“寇乱亡失”，说：“然他人无得见者。”从此引起对傅山的特别关注。同年11月8日，在琉璃厂有正书局买得石印《傅青主自书诗稿》一册，两个月后收到二弟周作人寄来的竹垞抄《傅青

主持》（“持”，原文如此，当误）一册。1927 年底，鲁迅在《日记》后专门写了一篇《西牖书钞》，共五则，其第一则云：“严元照《蕙棂杂记》：近见徐昆《柳崖外编》载傅青主先生一帖，语极萧散有味，录之于此云：老人家是甚不待动，书两三行，眇如胶矣。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，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，听甚么飞龙闹勾栏，消遣时光，倒还使得。姚大哥说，十九日请看唱。割肉二斤，烧饼煮茄，尽足受用。不知真个请不请？若到眼前无动静，便过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。”纯然白话一篇！鲁迅在《日记》后附《书账》是常例，而写《书钞》却只有这一次，其重视程度不同寻常。

鲁迅收购的其他山西文物，有刻有“长子”、“襄垣”字样的小币，有印有“安邑化金”的圆足布，有《大云寺弥勒重阁碑》拓片（按，大云寺在猗氏县仁寿寺），有《潞州舍利塔下铭》拓片，还有“山西新出土”的墓志拓片等，分布南北各地，难以计数。山西是古物之乡，面对这些古物，就是面对历史，面对人世沧桑，面对整个中华民族。那是人类生命的永久的记忆。鲁迅在观察着、研究着历史，也在研究着、认知着山西。

另外，山西的一些去世的人，也会影响着鲁迅对“山西人”的看法，比如《隔膜》中所写的冯起炎。鲁迅说：“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，闻乾隆将谒泰陵，便身怀著作，在路上徘徊，意图呈进，不料先以‘形迹可疑’被捕了。那著作，是以《易》解《诗》，实则信口开河。”鲁迅又引其结尾处有似“自传”的“十分特别”的话：“臣……别无愿求之事，惟有一事未决，请对陛下一叙其原由”，原来冯起炎在姨母家“见一女，可娶，而恨力不足以办此”，又在另一姨母家“见一女，可娶，而恨力不足以办此”。有此“二恨”，“若以陛下之力，差干员一人，选快马一匹，克日长驱到临邑，问彼临邑之地方官：‘……’，诚如是也，则此事谐矣。二事谐，则臣之愿毕矣。”鲁迅说冯生员“何尝有丝毫恶意？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，想一举成名，天子做媒，表妹入抱而已”，然而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却称其“狂妄”，判处“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，给披甲人为奴”。鲁迅写此文是揭露清代文字狱的，但其受害者却是这么一个小文人，我们在痛恨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可恶的同时，也会感到冯起炎这么一个山西人的迂腐气。

二、黄河岸边的“考察”

山西政治上的特殊性，不能不给鲁迅留下特殊的印记。

以共和制为特征的中华民国取代君主专制的清王朝以后，中华大地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和，而是陷入军阀混战之中，所谓的“中华民国总统”也像走马灯一样，换了又换。特别是各地的军阀和政客们，“你方唱罢他登场”，谁都可以当官，又像土匪，官匪不分。这种混乱局面，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，阻碍着生产的发展，使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即在首善之区的北京，这种混乱局面也时常出现，“国民军”的几进几出和发动“首都革命”就是一个例子。

跟这种现象相反，山西自辛亥革命首义成功，阎锡山上台执政，在很长时间里，政局相对稳定。他是直到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跟南京的“中华民国总统”蒋介石同时被推翻的。阎锡山当政以后，在发展生产上，在乡村政治体制改革上，在教育建设上，在社会治安以及禁止妇女缠足等移风易俗上，确实做过一些实事，如实行“六政三事”，提倡“村本政治”，农村建立“息讼会”等。山西的地理形势也便于他搞独立王国。通过宣传，山西在外界颇得好评，被称为“模范省”。20年代，梁漱溟等好些文化名人，都曾来山西考察过，写文章称赞过。鲁迅之所以能够在山西的土地上逗留，与此有关。

那是1924年夏，鲁迅和京津名教授李济之、蒋廷黻、陈定谟以及名记者孙伏园、王小隐等10余人，应西北大学之邀，赴陕西做暑期讲演之旅，共40多天。返程途中，一行人对到山西一游颇感兴趣。孙伏园在《长安道上》写道：“我们在黄河船上，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”，如“秦、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，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、秦，盖秦、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，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”。又说：“山西的好处，举其荦荦大者，据闻可以有三：即一，全省无一个土匪；二，全省无一株鸦片；三，禁止妇女缠足。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，但这三件已经有足多了。”唯其如此，一行人很想渡河沿同蒲路返京，但未如愿，而是改由陇海路转京汉路返京。为了坐实有关山西的传闻，他们特地从现三门峡一带渡河北上，“登岸参观”。孙伏园说：“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，住户只有几家”，大约属今平陆县吧。登岸后，“遍地都种花红树，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，在树上随摘随吃，立着随吃随谈，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，有小学校一所，村中无失学儿童，亦无游手好闲之辈。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，买得花红一大筐，在船上又大吃。夏浮筠先生说：‘便宜而至于白吃，新鲜而至于现摘，是生平第一次’，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。”在其他人的笔下，也都是片叫好声。“入西门，孔庙附设教育会、农会、拒毒会及洗心社等机关，知山西人犹有事可办”，“吴排长谈该省自治成绩甚备，境内无乞丐，盗贼，烟民，视其他临省大不侔矣”，“岸上颇有新栽之树，逐渐成荫，略见阎督政绩”，“山西一面果木森森，河南一面牛山濯濯……”

鲁迅没有专门记述这次亲眼观察山西的感受，只在《日记》中简单记道：“午抵函谷关略泊，与伏园登眺，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。”他在别处说过这次到西安喝了几口黄河水，原来要写长篇历史小说《杨贵妃》的兴致也被破坏了，但那指整个“西北之行”，不是指“与伏园登眺”的印象。即使说他不像孙伏园等人那样感到满意，也不能排除其北渡黄河“登岸参观”，是出于要看看山西这个“模范省”政绩的“动机”。孙伏园在船上所闻，其他人在黄河岸边所见，鲁迅该是一并收入自己记忆的。

这就是鲁迅脚踏山西土地的实录，是他跟三晋大地联系上仅有的一次，真的是历史的一瞬。期间有关山西的各种传闻、各种印象，是牢牢刻在鲁迅脑海中了。

三、“狂人”的原型出在繁峙

把山西跟鲁迅联系起来的还有一条渠道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，是在山西做幕友的阮家两兄弟。二人是鲁迅的亲戚，鲁迅从中获得的印象是刻骨铭心、永远难忘的。

鲁迅的大姨母生了四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其中三儿子四儿子都在山西做事，分别叫阮和荪、阮久荪。久荪又名文恒，字久巽，《鲁迅日记》又写作久孙、九孙，1886年生，排行最小，自称六男。他于1915年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，不久到京做事，多次到鲁迅处闲谈。次年6月到山西繁峙县做“师爷”，就是给县里的长官当参谋。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是给人当“师爷”的，其三兄和荪同在繁峙，早来三个月，《鲁迅日记》同年3月25日：“晚约和孙广和居饭，夜别去，明日赴繁峙也。”阮久荪实际是来投奔三哥和荪的。

久荪到繁峙后，给鲁迅写信4封，鲁迅回信两封。不久，他得了一种名为“迫害狂”的病，时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。10月30日午后，他神色慌张地逃到北京，先住西河沿客栈，听到楼上人的走动声，以为是布置好的埋伏，接连换了几个房间，都不能安住。搬到鲁迅所住的绍兴会馆，一清早去敲鲁迅住室的门窗，并且发出凄惨的叫声：“今天要被拉去杀头了！”鲁迅对他这个姨表弟一直是热心照料的。《日记》10月30日记“久孙到寓”，31日“下午久孙病颇恶，至夜愈甚。急延池田医院诊视，付资五元。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，并别雇工一人守视。”在送往医院途中，周作人记述：“久荪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，突然出惊，面无人色。”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看望，可能因为并不见好，遂付清了医院的费用，又为久荪买了足一个月用的药物，然后雇人送回绍兴老家。

阮久荪住在绍兴会馆时，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各写了一封绝命书，言词备极惨痛。给母亲信中写道：“繁峙县张执事性柔弱，寻常大抵哥哥代定主意，是以受恨者甚多。此次系繁邑绅商各界，密议决定，设计陷害，各捐资金，沿途贿嘱，意将哥哥与弟致之死地。”又说：“男承母亲抚育之恩，未能稍尽人子之道，现已临刑，有时只有望南肃拜为永别之礼。心乱神昏，不知所禀。”在给姐姐信中还有“弟……不幸祸遭不测，永无返乡之日，痛哉痛哉”的话。据查询，只知当年那个该县知事名叫张伯骧，“繁邑绅商各界，密议决定”云云，是否真有其事，难以肯定，不过存在于官场的那种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阮久荪在“繁邑”应该是看到了的。他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，才引发了“迫害狂”。

阮久荪被送回老家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很快痊愈。后虽到过北京，但再未从事“师爷”之职，只在故乡坐馆教书，还给鲁迅寄过两次干菜。

鲁迅的经典之作《狂人日记》，主人公即以阮久荪为原型，又“杂取种种人”，拼凑而成。久荪患“迫害狂”，其症状是典型的，鲁迅目睹，印象深刻。鲁迅从对古文化的探索中发现，所谓“古代文明”，所谓“中华乃礼仪之邦”等等，都不过是假象，它掩盖着“礼教吃人”的罪恶本质。中华五千年历史实乃一部在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禁锢下“人吃人”的历史，吃人的

人也会被吃，被吃者的儿子也会吃人。阮久荪患“迫害狂”，不纯是生理问题，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倾轧等造成的，是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映。而久荪的患病之地，正是山西。鲁迅把这样一个具体事件，概括、提炼、升华到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行总结和鞭挞的高度，主题极为深刻，引人深思。

阮久荪的三哥和荪，一连十多年都在山西做事。从他跟鲁迅通信情况看，他曾到过五台、潞安（今长治）、太原等地，可能仍是干他的老行当，即当“师爷”。他曾向鲁迅赠过山西的糟鸭卵、汾酒等名产。1924年，他还从“并州”（今太原）给鲁迅写过信。由此可知，由姨表弟构成的这一条连接鲁迅和山西的渠道，延续了好多年，它是鲁迅时常记起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四、一个主将和一群战士

1924、1925、1926 这三年，在鲁迅一生中是很重要的时期，在鲁迅和山西的关系史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一时期团结在鲁迅周围的进步青年中，山西人占了很大一部分——如果把以高长虹等人为骨干的狂飙社算进来，这一批人占了绝大部分。鲁迅跟这些山西青年有共同战斗的喜悦，也有过误解和龃龉；有生活上的相帮相扶，也有因人生态度或政治见解不尽相同而终至分道扬镳。

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，也是一场思想革命。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，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代替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，张扬以人性解放和自由、民主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。这一运动遭到文化守旧主义者的顽强抵抗，到 20 年代初，新文化运动陷入低潮。原来的新文化队伍发生了分化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投降，有的自然仍在战斗。鲁迅属于后一种人。他曾经苦闷过，彷徨过，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“戟”——他是“荷戟独彷徨”，而“彷徨”的原因不在别的，是感到“孤独”。客观上需要有人在思想领域开辟新的战场，打一场新的战斗；主观上，鲁迅深感光靠原有的战士远远不够，必须造就一支年轻的力量，开辟新的阵地。另一方面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，当年在中学读书的一代人，这个时候已经成长，可以走上战场了。这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，为一场新的思想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而这一思想革命，1924 年酝酿，到是年底、1925 年初便开展起来，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，是鲁迅和徐旭生二人，见《华盖集》里的《通信》。

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一批山西青年来到了鲁迅身边，包括石评梅、刘亚雄、吴曙天三员女将，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荆有麟、高歌（狂飙社成员），五四时期就跟胡适、陈独秀通信并写文章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的榆次人常乃德（狂飙社成员），搞政治活动的王振钧，高长虹和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其他山西成员阎宗临、段复生、高沐鸿等。这些山西青年集合在鲁迅的旗下，跟鲁迅一起战斗。1926 年 8 月 26 日鲁迅离京南下，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的人中，山西人占了将近一半，有石评梅、荆有麟、高歌、段复生等人。

石评梅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她写了许多诗歌、散文和其他形式的作品，是上世纪 20 年代我国女性文学星空里一颗耀眼的明星。其父石铭，字鼎丞，青年时代中举，在文水、赵城等县当过教谕，后一直在太原一些文化单位做事。石评梅从小跟父亲在太原读书，1919 年考入北京女高师，就是后来的女子师范大学，1923 年 10 月鲁迅开始在该校兼课时，她已经毕业，留在附中任教。石评梅在《国风日报》的《学汇》专刊上发表过多篇诗文作品，小有文名，鲁迅或已听说。1922 年 12 月鲁迅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柯来女高师讲《女子与其使命》，石评梅听了讲演，见到了鲁迅。1924 年底，石评梅和朋友陆晶清、司空蕙以女师大蔷薇社名义创办《妇女周刊》，鲁迅十分关注这个刊物，在跟许广平通信中（《两地书》）多次提及。一次许说：“……《妇周》居然支持了这些期。现在呢，她去了，

恐怕纯阳性的作品，要占据《妇周》了（除波微一人）。”这波微就是石评梅；她，指陆晶清；在陆走之前，司空蕙早已离开，此时只留石评梅一人坚守在《妇周》的阵地上。《鲁迅日记》上记“石评梅来”多次。石评梅多次向鲁迅约稿，鲁迅批驳陈西滢的《寡妇主义》即在该刊发表。两人最后一次见面，是石评梅送鲁迅南下。1928年石评梅因病而逝，鲁迅听说，在给川岛信中沉痛地说：“据京报，评梅死了。”

刘亚雄是女师大学生，跟鲁迅系师生关系。在“女师大事件”中她为核心人物。“女师大事件”开始后不久，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属于女师大最早一批共产党员，也是鲁迅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刘说：“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很多党员都有个人联系，北京学联和女师大的党员常拜访他，我们也常去鲁迅家交谈。当时鲁迅虽不是党员，但在斗争中公开出面的常常就是他，党当时无法公开活动。”“五卅运动”中，女师大集体加入北京“学联”，刘亚雄和郑德音等四人为女师大学生会的与会代表。1926年“三一八惨案”后，这张代表名单被北洋军警查获，北洋政府通令开除学籍，并指令全国各高校不得再招收这些学生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共党组织安排刘亚雄转“红都”武汉，以后又到苏联留学。行前她于8月20日向鲁迅辞别。后来，刘长期在共产党内担负领导工作。1942年10月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界隆重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，刘在会上讲了话，当时媒体上的标题中冠她以“鲁迅的女弟子——新来此间的晋东南女专员刘亚雄”的头衔。

属于国民党方面的山西青年，有王振钧。王振钧，天镇县人，在上北京大学时加入国民党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，王任宣传部秘书主任，于1925年8月创办《国民新报》，“以主张国民救国，宣传民族自决，打倒帝国主义，锄除黑暗势力为宗旨”。该报总编辑邓飞黄，曾几次找鲁迅（《日记》有载）。年底增出副刊及英文版，王振钧特跟鲁迅联系，请鲁迅和张凤举逐月轮流编辑该报副刊乙刊（文艺版），鲁迅欣然答应。1925年12月和其前后，鲁迅有多篇文章在该刊发表，是他那一时期最主要的一块阵地。“三一八惨案”中王振钧被北洋军警殴打，此后《国民新报》因被国民党封闭而停刊。

跟石评梅创办《妇女周刊》的同一时期，狂飙社盟主、孟县人高长虹创办了《狂飙》周刊，猗氏（今属临猗）人荆有麟和朋友创办了《民众文艺周刊》。在《狂飙》之后、《民众文艺周刊》之前问世的刊物，是孙伏园、周作人等编，鲁迅为16名撰稿人之一的《语丝》。稍后问世的，则有徐旭生主编的《猛进》和鲁迅主编、高长虹和荆有麟作为副手为之“奔走”的《莽原》。另外还有胡适等人主办的《现代评论》。这些刊物都为周刊，基本上属于思想文化刊物，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为主。正是这许多周刊构成了1925年初思想文化界的繁荣景象，鲁迅和徐旭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。高长虹和他的狂飙朋友后来办了《狂飙》不定期刊和出版过20多期的袖珍小刊物《弦上》。从前述名单可以看出，办这些刊物的，属“五四一代”和“五四后一代”两代人，而“五四后一代”几乎都以山西人为核心。

高长虹等山西文学青年之与鲁迅，不仅仅是办刊物的关系，从思想倾向说，他们受鲁迅

的影响很大，所为文大都跟鲁迅谱同一旋律，取同一步调。鲁迅提倡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，这些青年，所写文章均属此类。鲁迅提出中国人有爱面子思想，高长虹等写了类似的文章。在“女师大事件”上，鲁迅跟陈西滢（即陈源）发生激烈笔战，这些青年都站在鲁迅一边，几乎都写了跟陈西滢论战的文章。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后，高长虹在《弦上》发表多篇短文，直指段祺瑞执政府，具有极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战斗力，跟鲁迅所写文章一样，像匕首，如投枪。笔者曾把高长虹和狂飙社主要成员向培良、尚钺、高沐鸿、高歌、黄鹏基、段复生（沸声）等称作《莽原》的第一集团军，他们在《莽原》上发表的文章占到该刊发表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。高长虹是鲁迅最器重的一位山西文学青年。鲁迅为他的同乡青年作家许钦文编了一本小说集出版，特请高长虹为之作序，这在鲁迅一生都是仅有的一次。鲁迅还为高长虹编辑出版了《心的探险》一书。

1925年初，高歌、向培良、吕蕴儒等狂飙社成员，在鲁迅支持和具体指导下，在河南开封办了一份文艺刊物，叫《豫报副刊》。这年1月22日，鲁迅“得高歌十八日开封函”。2月24日，“晚高歌来……夜蕴儒、长虹、培良来”都为此事。《豫报副刊》于这年5月4日问世，随《豫报》发行，每天出版16开纸四页。鲁迅时刻关注着高歌等人的工作。4月22日，鲁迅“得吕琦信，附高歌及培良笺”，得知副刊已筹备就绪，即将出刊，为他们“不特用大胆无畏的态度，来批评社会上一切”，“还出一种副刊，专注意新文化运动”，感到高兴，于次日分别给吕、高、向三人写了回信，要他们勇敢地向前走去。高歌写信倾诉自己在“抢人”和“被抢”上的矛盾心情，鲁迅当即回信给予耐心解释。《豫报副刊》实应为狂飙社刊物。后来安徽霍丘的张目寒进去，跟高歌和狂飙社另一成员尚钺等人发生矛盾，埋下了狂飙社跟未名社安徽四作家发生激烈冲突的伏线。

在这一群战士里，常乃德在五四时期已为知名学者。他属榆次常家，1898年生，跟高长虹同岁。在五四运动中，他发起成立“工学会”（后改为“平民教育社”），被推为北京“学联”成员，任教育组主任。又跟山西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等编辑《国民》杂志。他是北京学生界令人瞩目的新锐。1920年留日，后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，兼“商务”编译所编辑。1924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。1925年4月17日随高长虹拜访鲁迅，以后又多次拜访或通信。此人后来在“高鲁冲突”中跟高长虹一起，和鲁迅有过论争。

前边提到三员女将，尚未说及的是吴曙天。吴为翼城人，原名冕藻，1903年生。其祖父曾为甘肃道尹，思想保守，把她指婚给一个无赖小子。她为逃婚，跑到南京，跟章衣萍相识，以后结婚。她是1924年9月28日随章衣萍、孙伏园一起走进鲁迅西三条寓所的，以后成为鲁寓常客。此人很有写作才能，虽然写作不多，但所写鲁迅是非常生动的。据《鲁迅日记》，1924年她来4次，1925年来17次，1926年1次。后鲁迅移居上海，她和章衣萍也到了上海，继续来往。她著有《曙天日记三种》，所写鲁迅醉后情景，即出此书。

五、鲁迅和荆有麟

跟鲁迅交往最多、维持时间最长、也最具有警示意义的，是荆有麟。

荆有麟于1903年生于猗氏（今临猗）牛杜镇太范村一个行医世家。在高小读书时，受一位教师的影响，追求进步，曾跟同学一起发动过罢课斗争。1922年到太原，不久又到北京，投靠同乡前辈景梅九，在景所办《国风日报》社帮忙，并开始写作，稿子都在该报《学汇》专刊发表。那一时期，荆和石评梅是在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山西青年作者（高长虹也发表过）。景这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积极提倡世界语，对荆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一定影响。1923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，荆进入这个学校学习，成为鲁迅的学生。荆写下文章，常常要拿给鲁迅修改。1924年冬，荆前往西三条鲁寓拜访，从此成为鲁迅家常客。

1925年是荆有麟赴鲁寓最多的一年，有时一个月来寓20多次。旧历除夕之夜，他一个人觉得苦闷，来找鲁迅闲谈，共同送走大年夜。荆发现新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印错了一张照片，鲁迅亲自到藏书室找来资料，加以对照，证明确实有误，就让荆写文章更正。这年初夏，上海美专学生、湖南长沙人金仲芸（即莫瑛，又叫莫仙瑛）来到北京，荆一见倾心，进入热恋，不久同居，后来在上海正式结婚。她跟荆有麟来访，也常独自前来，是鲁迅母亲鲁瑞和朱安女士的谈话伙伴。由于此二人经常在鲁寓，鲁迅的许多生活情形都收入他们的眼底，为荆后来写《鲁迅回忆断片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荆回忆说：“由十三年到十五年（即1924-1926），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，我常常——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，不特听多了先生的谈论与意见，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，直到先生离开北京为止。”1926年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，鲁迅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，第一个避难地点，便是荆有麟的住处，也是《莽原》周刊的通讯处。鲁迅后来转入外国人办的医院，荆又担任了鲁迅和家里的联络员，两头照料。

两人交往初期荆有麟办的一件大事，是《莽原》周刊的创办。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后，鲁迅介绍荆到邵飘萍的《京报》做校对，荆遂跟邵飘萍相熟。他和朋友办起《民众文艺周刊》，由《京报》代印，请鲁迅代为校阅并做主要撰稿人。邵飘萍想完善7种附刊，将一种附刊改为文学方面的内容，请荆设法。荆先找高长虹，要高把刚刚停办的《狂飙》周刊移到《京报》，继续办下去，以他参加狂飙社为条件，高长虹不干。荆去找鲁迅。鲁迅当即同意，并邀高长虹担任助手。这便有了1925年4月11日晚上的“五人吃酒”。10多天以后，《莽原》周刊出世了。该刊通讯地点设在荆有麟的住处——西城锦什坊街96号。以后所有外来稿件都寄到这里，再由荆转给鲁迅，所有退稿和其他事务也是荆有麟办的。而跑印刷厂和书局以及校对等，则是高长虹的任务。他们三人，再加狂飙社的尚钺和高沐鸿，是《莽原》同人中在周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5位。

荆有麟自跟鲁迅相识以后，就想方设法支持鲁迅，维护鲁迅，宣传鲁迅。《莽原》出刊后